

# 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与大学内部治理

易希平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若不厘清大学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形成与运行的迥异逻辑,若不调适好大学与政府、学术与行政、学校与教师的关系,大学内部治理则很难形成优良的品质并达成良性的运行,大学内部治理中期待已久的“去行政化”则只会是流于形式。“去行政化”是大学内部治理的一种自然选择,它指向大学的本源,指向“人”与“学”的诗意融合,同时,它揭示了大学内部治理的趋向,而非提供治理的具体模式。

**关键词:**大学的本源;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去行政化;大学治理趋向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14)07-0001-03

大学作为一个组织机构,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管理的问题。张楚廷先生将大学的管理区分为外部的管理和内部的治理<sup>[1]132</sup>,借用此概念,在此主要探讨一下大学的内部治理问题。与中世纪早期大学的学生治校和教授治校不同,现今大学多数采用的是以行政为主的治理方式<sup>①</sup>。

与精神指向的大学理念相对应,大学的治理则更多指涉现实的实践,其必然涉及学术与行政的关系问题,必然关乎“行政化”与“去行政化”的问题,必然延伸至大学的本源问题。因此,本文并不仅仅局限于谈大学治理的问题,而是通过审视大学的本源、分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运行逻辑以及探究“去行政化”的意蕴,期许获得对当今大学内部治理问题的启发。

## 一、大学的本源在于“人”与“学”

“大学作为一种学术制度,一种学术机构,它必定有一些内在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决定了大学之所以是大学,而不是其他什么机构,而中国大学之所以水平比较低下就是因为这些基本因素被遮蔽了,被排斥了”<sup>[2]</sup>。那么,大学的内在东西、基本因素究竟指涉什么,这其实就是关乎大学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sup>[3]</sup>;“大学谓大师之谓也,大学谓大‘学’之谓也,大学谓赋予大智大慧之地之谓也,大学谓求人生之大彻大悟之地之谓也”<sup>[4]</sup>;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sup>[5]</sup>;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学术性是大学组织的基本属性,大学的逻辑在于对高深学问的追求;中世纪的大学就是学者的行会,同时也是一种超级文化的教会<sup>[6]</sup>;大学的这些性质决定了大学是以学术为本位,是将学术价值作为最高价值的,是以将学术智

慧转化为人生大彻大悟为鹄的的。

从大学的自身来理解大学的四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大学的四大职能均是以“学术”与“人”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是以学术为中心的教学,是以学术来启迪人的智慧、锤炼思想、陶冶情操的;科学研究,是进行学术研究,是发展知识,创造知识,科学研究将人类“求知的本性”和“自由的本性”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社会服务是以学术成果来服务社会,社会服务使学术更直接、更具体、更实在,使学术与人更好地契合,使大学更加富有生命气息和活力;文化传承创新,是“人”对“学术”的传承和创新,使大学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构成一所大学最本质的品质是什么?多年前,在新英格兰,据说路边的一根圆木上,一端坐着一个学生,另一端坐着马克·霍普金斯,那便是一所大学”<sup>[7]</sup>。换一句话来表达,“当霍普金斯与学生坐在一起交谈、讨论时,大学就发生了”,这句话鲜明地揭示了大学最原初的品质和联系。在大学里,与出身不同、年龄相仿、生活背景迥异,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交流、沟通,真理、智慧在交流、讨论中生长,气质、涵养在交流、沟通中生成;在大学里,通过师生的“在一起”,人类本性中最大的驱动力——要求理解、认识和发现的欲望与好奇心,被极致与完满地发挥。简言之,大学的本源就在于“学”与以“学”为生的“人”以及“学”与“人”的融合。

## 二、大学原初意味的淡化及其大学本源的背离

### 1. 大学原初意味的淡化

大学产生之初,师生以学术为纽带的“在一起”构成了大学最原初的意味,非学术性的行政管理事务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几近忽略不计。随着大学的迅猛发展,学校学术性与

收稿日期: 2014-05-08

作者简介: 易希平,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学博士,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原理、教育基本理论。

非学术性的管理事务日益增多,出现了专门从事大学管理的机构和阶层。特别是所谓的“巨型化大学”的出现,大学组织属性发生极大的改变,以美国董事会制度为代表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兴起,行政权力在大学组织中开始占据重要的地位。菲利浦·G·阿特巴赫指出,在高等教育领域,行政权力始于美国的大学<sup>[8]</sup>。美国的高校董事会制度催生了管理阶层的兴起,大学演变为围绕学科和行政单位的组织,伯顿·克拉克认为现代大学本质上是一种围绕学科和行政单位进行活动的矩阵型组织<sup>[9]</sup>,因此,现代大学事务主要围绕学术和行政而展开,进而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和权力结构矩阵:学术文化和行政文化、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由此决定了大学组织属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学术性的组织和行政性的组织系统并存、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存的二元化结构,既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显著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淡化甚至弱化了大学最原初的意味。由此,能否正确处理学术与行政二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了大学的健康发展。

## 2. 大学本源的背离

在应对学术与行政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时,大学似乎有意无意地背离了与最原初意味的联系,甚至在背离的路上越走越远,师生之间缺少心与心的相会、相遇与相通,思想的锤炼与心智的磨砺在很多时候成为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奢望。

在处理行政与学术关系的过程中,我国大学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外部来看,大学被当作政府的行政下属性组织,在国家行政管理序列中的具有行政级别,出现了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副厅级大学等“奇异景象”;从内部来讲,行政价值被某些人作为最高价值,行政权力经常在事实上成为大学的中心,“官本位”思想“深入人心”,产生了副部级校长、正厅级校长、副厅级校长等“独特风光”。正是这种“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使得以强大政府权力为后盾的高等教育行政权力系统从上至下、从表及里地渗入到这个体系的毛细端,将“中国所有大学整合在这样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与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靡不在其裁中。这个体系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基本状态和发展的前景”<sup>[10]</sup>。

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必然催生了大学的“行政化”,加速了大学背离学术的本源,背离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的本源,背离了以学术为生的人的本源。

## 三、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形成与运行逻辑

尽管“行政化”之于大学的危害,众人皆心知肚明;尽管“去行政化”之于大学的意义,众人皆心照不宣;然而,若不厘清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形成与运行的迥异逻辑,大学内部治理则很难形成优良的品质并达致良性的运行,大学内部治理中诟病已久的“行政化”将会继续留存在历史舞台中心,期待已久的诉诸回归“大学本源”的“去行政化”则只会

是流于形式、徒有声势。那么,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形成与运行的逻辑如何呢?综观世界各国大学的发展历程,考量大学权力所彰显的大学精神与理念,大学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形成与运行有各自独特的逻辑路线。

大学学术权力形成与运行的逻辑路线可概括为“自下而上”。“自下而上”的路线表明,越亲近学生、越贴近教学第一线、越深入课堂的教师越有可能成为学术权威,越疏离学生、越远离教学第一线,越脱离课堂的教师越不太可能成为学术权威。学术权威或权力是内部生成内源性权威或权力,这种内源性的学术权威或权力蕴含大学最原初的从容、淡定、淡泊、宁静的气质,古希腊先哲所推崇的闲暇就应该是这样的心境。只有在纯粹的安宁之时,人的心智才能自由地追慕真理和智慧,因此,优良的大学教育总是置于淡泊宁静的处境,总是在自由和闲暇中,撇开对真、善、美的追求,而内源性的学术权威或权力所烘托出来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亲熟感正是优良大学教育的起点。

大学行政权力形成与运行的逻辑路线可归纳为“自上而下”。“自上而下”的路线具有鲜明的官僚制的等级次序,上一级绝对管束下一级,下一级绝对服从上一级,无数事实证明,这种严格的等级次序在很大程度上必将压制独立的思想,必将窒息创新的活力。行政权力是外部给予的外源性权力,尽管外源性的行政权力在设计上不可避免地会留给人一定的行政自由度和思考的余地,但是,行政权力的等级性和强制性天然地与大学最原初的温情、淡泊、宁静相去甚远,行政权力的威严与过度将注定会造成大学与真、善、美的越来越严重的“分隔”。

任何一所大学,都应该承认并正视这两种迥异的逻辑路线,都应该在教育实践中自觉地按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逻辑去思考与行动,若强行用行政权力的逻辑路线去遮蔽甚至代替学术权力的逻辑路线,结果只能是大学行政的强化、泛化与中心化,大学学术的弱化、窄化与边缘化,只能是大学本源的背离与异化。

## 四、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去行政化”选择

### 1. “去行政化”是大学内部治理的一种自然选择

既然厘清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具有相异的逻辑路线,那么,脱胎于“官僚制”的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就是不恰当地将行政权力的逻辑遮蔽甚至代替学术权力的逻辑。在行政与学术的关系上,就自然产生了以行政压制学术的问题;行政与学术的关系,自然就涉及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前文提到,“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是大学“行政化”的根源,这好像给人一种“政府的治理与大学的学术自由”不可调和的印象。实则不然,有例为证。德国与美国在大学的治理上截然不同,美国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而德国是基于国家意志的;其实这种不同是形式的、表面的,在内容与实质上,美国与德国是完全一致的,都尊重大学的特点,

都竭力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从根本上保障了大学的繁荣,也保障了社会的繁荣,保障了国家发展的不竭之文化源泉<sup>[1][157]</sup>。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迥异逻辑、美国与德国大学治理的典范和启发,预示了中国大学的“去行政化”是大学治理的一种可行选择、一种明智选择,更是一种顺乎大学原初“天性”的自然选择。

## 2. “去行政化”指向“人”与“学”的诗意融合

大学缘起于“人”的自由发展,缘起于“人”对“学”的向往和追求,大学是“人”对“大”的“学”的自由追求的实体体现。因此,大学最终归结为自由追求和自由发展的融合,归结为“人”与“学”在高深层次上的融合,这也正是大学的本质之所在。作为一种自然选择的“去行政化”必定指向“人”与“学”的诗意融合,指向学问、真理的探求和人的自由、个性发展。学术自由的理念既是人的自由精神的体现,也是大学得以存在发展的要义,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只有以学术自由的理念指引下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无论大学的学科如何渐变繁复,无论大学的机构如何日益庞杂,无论大学的人员如何与日俱增,大学的发展终归不离其“本”——“人”与“学”。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也只有以实现“人”与“学”的自由自然融合为目标,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和可能性。大学的“人”不是行政机构中的职员,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大学人,是校长,是教授,是学生。因此,只有在大学人以学术自由为理念指导的主动自觉的参与下,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去行政化”。

## 3. “去行政化”揭示大学内部治理的趋向,而不是提供具体治理模式

“去行政化”是大学治理的自然选择,但是,作为一种选择,其路向可以截然不同,如美国与德国的大学治理,就是殊途同归的绝佳范例。同理,在现阶段的中国,大学的治理当然也可以与美、德迥异,“去行政化”可以采取不同的路径,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中国大学的“行政化”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合力使然,且在多年运行之后,产生了强大的惯性与惰性;另一方面,“去行政化”并不是摒弃行政权力,而独留学术权力。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哪所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和各自的功能。学术权力的合法性源于知识的专门性以及各学科学者及其组织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学术权力更关注学科发展;行政权力在大学管理中的合法性源于其合理行使能有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能实现多方利益平衡,保证资源分配更加合理以及有利于增强大学对社会的适应性和敏感性等,行政权力相对学术权力而言,更关注学校组织整体利益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融洽关系<sup>[11]</sup>。这两方面力量的有效协作能保证大学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的有效管理。

“去行政化”并不是提供一种大学内部治理的具体模式,而是揭示大学内部治理的趋向,即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师治校为导向的大学内部治理。它强调现在的大学治理,在政府与大学、行政与学术、学校与教师的关系上,平衡点要向大学、学术、教师偏移。我们要有能力去发展一种简练而精准的理解方法,以便能对这个动态的平衡点做出即时的调整。“去行政化”告诉我们:现在的大学里行政权力依然占据着比较强势、中心、泛化的位置,学术权力却处在比较弱势、边缘、窄化的状态,而不是说大学不需要行政权力。大量事实证明,任何一所大学,若没有行政权力的高效运行和合理资源配置,学术的繁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问题不是去寻求一种“去行政化”的简单而理想的模式,而是要有能力找到政府与大学、行政与学术、学校与教师之间的恰当的动态平衡点,使大学、学术、教师处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 注释:

①从历史来看,早期的大学主要有两种形态,即学生治校和教授治校,比如,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分属其例。但是随着大学的发展,大学的专业划分日益细致,大学的人员日益庞杂,大学的组织机构也日益庞大,学生和教授已经不能够完全地担当治理大学的职责,因此,出现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即现今大学主要治理组织——行政机构。

### 参考文献:

- [1] 张楚廷. 高等教育学导论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
- [2] 韩水法. 大学与学术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3.
- [3] 王尧. 给蔡元培校长等定什么级别 [J]. 读书, 2010 (12): 108.
- [4] 张楚廷. 高等教育哲学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4: 339.
- [5] [德] 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 [M]. 邹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150.
- [6] [美]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M]. 王承绪,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6: 135.
- [7] 哈佛燕京学社. 人文学和大学理念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 156~157.
- [8] [美] 菲利浦·G·阿特巴赫. 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趋势 [M]. 蒋凯,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3.
- [9] [美]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M]. 王承绪, 译.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 [10] 韩水法. 世上已无蔡元培 [J]. 读书, 2005 (4): 8.
- [11] 查永军. 中国大学学术管理中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冲突研究 [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责任编辑: 郝文斌]